

# 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之 对于科学史和医学史的应用\*

席文

摘要:人类学家的目标是发现一个民族甚或一个群体共享的、不同于他者的意义结构。共享的实在意义的全部组成,称之为文化。有很多方式把所有的身体异常划分成为种种疾病,不同文化中的人则做出不同的选择。因此,两种文化中的人不会患完全相同的疾病。信念可以引起和战胜真正的肉体疾病,因为身体对信念和意义做出响应。社会学家的目标是理解个体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结构、规范和价值观。社会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不同社会里医生权力的差异,权力是他们治愈疾病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新的疾病和疾病名称的改变,并非仅仅基于研究上的改进。医生就像其他社会成员一样,也对社会广为流传的价值观做出响应;如果他们不做出响应,他们就不可能非常成功地治愈患病的人。

关键词:科学史; 医学史; 史学; 方法论; 社会学; 人类学

作者简介:席文,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系中国文化与科学史教授、美国院士

我的话题是人类学和社会学,大部分例子来自医学史。这是因为医学社会学和医学人类学发展得不错,提供了不少好范例。社会科学对科学技术研究(stud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也格外有用。

首先,我假设大家没有在这些领域学习过。我将界定这些领域,并解释它们在我们所研究的各种历史中的作用。这两个领域都历史悠久,19世纪就开始呈现出现代形态。起初,这两个领域在目标和方法上明显的不同。20世纪的著名人类学研究,多数涉及的不是西方民族,通常都在欧洲势力范围的殖民地中,比如非洲人和南洋人。研究的目的是对文化的研究,而“文化”则是一个有多种含义的词。在上个世纪的人类学中,它开始表示一个民族所共享的、并用以对其经验进行

归类和理解的模式。例如,在中国文化里人们把褐色当作深黄色,而在美国文化里褐色却与黄色无关。两种文化都没错,这不过是一种文化差异。社会学则始于学者分析他们自己的社会结构。他们探究社会地位的差异、财富的差异、权力的差异,等等。这些差异多因国而异。例如,在美国和中国,教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就大为不同。两人彼此相处的方式取决于这些差异。

我将首先讨论人类学。

## 人类学

人类学有若干分支。我今天将谈论的一个分支,在美国通常称为文化人类学,而在英国则称为

\* 此文是作者应邀担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2009年竺可桢讲座教授期间,于2009年4月14日在北京大学所做竺可桢讲座的第二讲全文。谨以此演讲献给已故的席泽宗教授。这个系列讲座的第一讲《科学史和医学史正发生着怎样的变化》,见《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社会人类学。<sup>①</sup> 这门学问在发展出所谓参与者观察的技巧时,就变得重要起来。人类学家生活在与他们不同的人群之中,参与他们的工作并观察他们。人类学家研究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特殊的定期仪式(礼仪、礼俗)。其目标是发现一个民族甚或一个群体共享的、不同于他者的意义结构。人们如何看待自己与他人?人们如何相互作用?人们如何理解自己的社会与非人类世界,如何对之归类?人们如何理解变化?他们对诸如健康、疾病和康复之类的事情如何做出解释?这些就是共享的实在意义的全部组成,人类学家称之为文化。多数人类学家的目标就是理解文化模式。<sup>②</sup>

用汉语谈论仪式是困难的。因为研究人类学的人并不多,许多学生都把仪式看作非科学的,因此不值得研究。但是人际关系并不是科学的,如果我们想理解它们,我们就要使用一些允许我们分析其复杂性的概念。人类学和社会学提供的许多极为精妙的概念和方法,证明有助于对许多文化的研究。

仪式观念就是这些概念和方法中的一个,这个概念比中国古代的礼仪观念要宽泛得多。它指的是所有有效的被模仿的行为,而且还有超越行为有效性的意义。这个房间的每个人都理解,今天主持人介绍我之后,人们期待着我要演讲,期待着各位要听。主持人的介绍有效地提供了我的信息,但是其意义也是让各位有个准备,这次听的是演讲而不是说话。每位学生都学会了理解这种介绍仪式。这就是它有效的原由,就是其意义赋予演讲者以一定权威的原由。平常的生活充满着仪式。它们呈现出基本的文化模式。

让我举一个仪式有效性的例子。一个人在生活中从一个身份转变为另一个身份,就是人类学中许多有趣的话题之一。多数社会里,主要的转变就是诞生、从童年变为成年、从单身到结婚成家,以及去世。对于其中的每种变化来说,通常都有一个仪式或典礼,指引人们从一个旧身份转变为一个新身份:生育典礼、成人典礼、婚礼、孩子出生典礼,以及死亡典礼。婚庆用象征符号和特殊行为教少男少女如何成为夫妻,为他人接受他们成为夫妻有个准备,表示已经合法婚配,等等。

在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复杂详尽的典礼多记载在《礼记》里。今天在中国,城乡之间、社会层级之间、地区之间、富者与贫者之间、民族之间,这些转变的典礼都不同。但是每个人都经历同样的生命阶段,其亚文化都在教他们庆祝和哀悼的方式。

学者们建立他们自己的小文化。一位出席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会议的人类学家,可以通过了解官员们做的是什么事情、谁在会上发言、如何选择论文、谁决定每篇报告的论文、谁在小组里最先发言、人们在过道里如何相互指责,等等,来分析那个小文化。

一位人类学家想了解物理学文化,可以在某人获得博士学位时、某人在研究所或学系开始工作时、某人成为物理学会的官员时、某人退休时,等等,来看人们的举止。<sup>③</sup> 所有这些小型的入会礼和庆典,就像家族的礼仪一样,都是仪式。仪式把研究生转变成为研究助理,并赋予其研究者同事一个正规方式接纳他为合作者。仪式可大可小,大如大学毕业典礼,小如研究所领导介绍一位新同事。<sup>④</sup>

① 这两个专业的区别不少,可是在这里并不重要。这次演讲不是要对各门社会科学做一般的介绍,而仅仅是概述我发现在科学史研究中特别有用的两个方面而已。

② 人类学是一门多姿多彩的学科,不可能找到适合初学者阅读的一本单一的书描述它。要理解其当下——总是处于变化之中——状态的意义,我推荐阅读如下期刊最近各期:《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人类学与医学》(*Anthropology & Medicine*)、《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所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和《医学人类学季刊》(*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③ Peter Galison, *How Experiments E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这是关于这些问题和相关问题的一项著名的研究。

④ 参见 Bruno Latour,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7(见布鲁诺·拉图尔:《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刘文旋、郑开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 Bruno Latour & Steve Woolgar, *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见布鲁诺·拉图尔、史蒂夫·伍尔加:《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张伯霖、刁小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

## 人类学与医学

一旦认识到文化型塑了人的所有选择和行动,我们就能明白文化是理解医学的关键——医学在不同地方如何不同,怎样随时间变化。医学人类学家在很久以前就知道,两种文化中的人不会患完全相同的疾病。有很多方式把所有的身体异常划分成为种种疾病,不同文化中的人则做出不同的选择。

如果我们假定任何地方的患病经验都一样,我们就会犯严重的历史错误。例如,人们阅读诸如《伤寒论》之类的旧书,通常就认为“热”是“发热”的意思。在生物医学上,“热”是指体温高于正常值。但是在早期的中国作品中,“热”通常不是指医生测量出的体表温度,而是指患者经验并告诉医生的体内热感。<sup>①</sup>它与体内冷感“寒”相对。

《伤寒论》甚至19世纪的传统医书中,“伤寒”本身通常并非伤寒——现代词典给出的仅有的意思——而是涉及不同发热种类的许多类不同疾病。这就是我把“伤寒”按词义译为“Cold Damage Disorders”(冷损害紊乱)的原因,为的是提醒读者注意,古代之中国的疾病经验与今天是不同的。<sup>②</sup>

人们在成长过程中知道了什么是病患,什么是健康。他们从双亲那里学会如何做病人——就是说,他们感觉不舒服时人们期待他们有这样的表现、求谁帮助,等等。帝王时代,医生对疾病分类的方式发生过很大变化。自西医引进以来,疾病分类发生了更迅速的变化。

我们一想到医学就会想到医生。但是人类学家提醒我们,处理病患的人范围更广。卫生保健的第一步是自疗。如果你早晨醒来时头疼,你不

会直接去看医生,而可能仅仅服用阿司匹林或是正天丸。如果你不确定自己是怎么了,你会去问你的母亲、妻子、友人或者其他你信赖的人的意见。这通常是卫生保健的第二层次。如果你仍然感到没有好转,你或许会去药店要人推荐药。如果这些层次的卫生保健都失败了,你可能去诊所。卫生保健通常包括许多层次,只在最高层次才有职业医生。

传统中国也是如此。事实上,多数人从不看医生。中国人太多,多数人没什么钱,而医生又太少。在乡村,一位农妇很可能会把她患病的孩子带去找一位在山里采草药的邻居,或者去找一位铃医或法师。对于一位史学家来说,理解其治疗价值并不容易——但理解一位医生的疗法价值也不容易。今天,任何未经实验室试验验证的关于医学成就的报道,都被受过教育的人们所拒斥。但是,医学人类学在很早以前就表明,这个标准过于狭窄而不适用。

多年前,当时我和妻子住在英国的剑桥。一个夏晨,我醒了,站起来,立即就跌倒了。这看似很奇怪,我站起来,又跌倒了。我不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我问自己是怎么回事。如果是头痛,我应该会意识到,并会服用阿司匹林。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唯一的想法就是“如果长期如此,那将多么麻烦!”不久,我妻子注意到我躺在地板上。下一步的确就是询问她的意见。结果,她给一位友人打电话,很快就弄明白了,一种奇怪的新病毒也让几位友人都患上了感冒,等48小时就会好。由于我们不再担忧,我也就不必叫医生了。一天之后,症状开始逐渐消失,我确信不必治疗,就那样得了。

让我们想象一个古代中国的类似情况。某人早晨不能站起来,就像我一样感到不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很无助,但其感受严格地讲与我的不一

① “热”始终在这种意义下使用。《伤寒论》里最早出现过“发热”一词,但多数情况下,其用法太模糊,不能确定它指代的那个阶段的热感和高体温多少时候一次。

② 我曾给出过许多关于这类差异的例子(Nathan Sivin,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Contemporary China: A Partial Translation of Revised Outline of Chinese Medicine* (1972): with an Introductory Study on Change in Present-and Early Medicine, Science, Medicine and Technology in East Asia, 1987, (2),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关于单一中文疾病名称的意义变化的详尽研究,参见 Hilary Smith, *Foot Qi: History of a Chinese Medical Disorder*, Ph. D. Dissertation, History and Sociology of Scienc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8。

样。他会听说一系列可能的原因去思考,这些原因与我所知道的不一样。从前人们会考虑——现在中国部分地区仍然会考虑的一个原因就是,鬼神已经附上身体。其妻子会请来一位法师把鬼神驱赶出去。尽管今天看来很奇怪,但人们相信法师有控制鬼神的权威。不论这种控制是客观事实还是无关紧要,反正人们信它。这种信念往往比药物更有效。法师的仪式设计得就像我妻子打的电话一样,使患者确信其生命并没有真正失控,预期不久就会恢复常态。信念的确可以战胜真正的肉体疾病,因为信念可以引起真正的肉体疾病。身体对信念和意义做出响应,这是医学人类学最伟大的一个发现。

中国和西方的医生也都用信念治病。医生的行为方式、他所使用的语言、他使用仪器的方式,都会使患者发生变化。仪器不仅仅是诊断和治疗的工具,它们也是医生的知识和技能的象征,医生能用而他人不能用的象征。它们是包括医生和患者在内的某种仪式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把这种仪式称作一种科学仪式。运用科学的能力受人敬佩,给医生以极大权威,从而可以以序治乱。这就是人类学家认为我们要充分理解现代科学就需要分析其技术价值和象征价值的原因。

事实上,治愈疾病有三种情况。首先,多数患病的人即使不接受治疗也能恢复健康。人体在能响应反常时,就直接响应反常,恢复正常。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公元前370)以降,医生们就已认识到,他们最有效的方法不过是支持患者自我恢复。这也是《黄帝内经》和其他中国经典中的一个重要主旨。对于多数疾病,所有医生需要做——或者能够做的一切,就是促进恢复和处理症状。我们可以把这种恢复倾向称为身体的自响应。其次,中西医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就是物理和化学治疗能够影响人体过程并战胜疾病。我们可以将此称为技术响应。第三,身体对仪式和其他意义象征的响应。有些人类学家将此称之为意义响应。所有这三种响应都可能同

时发生。

并非很多人类学家都研究过去,不过,那样的洞见对历史研究同样都有价值。总之,对疗法的充分分析包括身体自愈能力、疗法的仪式和象征环境的效应,以及技术方法的价值。<sup>①</sup>与一位只懂技术部分的医生相比,一位受过训练懂得疗法三要素的医生可能是更有效的治疗专家。对于研究过去的医学史学家来说,同样的理解也是有益的。类似地,在天文学史方面,知道当时的人们怎么思考天空和事件,与懂得预言技能同样重要。例如,孙小淳和一位同事就撰写了一部论述汉代的人们如何看待天空的很有价值的著作。<sup>②</sup>

## 社会学

社会学的基本理念是,为了理解个体的活动,我们必须理解个体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结构、规范和价值观。每个社会对于正常的人际关系是什么、人们如何举止、他们应当视什么为好或坏,都有自己的理解。个体表现并非总是严格符合他人的期待,同样,人们也不抱有如此严格的期待。这些结构、规范和价值观都是理想,在教会人们如何生活方面至关重要。父母把它们教给孩子,老师把它们教给学生,甚至电视也把它们教给观众。这就是我们认识到中国人按某些方式行事,美国人按另外的方式行事的原因。我们可以明白,华侨们的行事方式既反映了其父母教的东西,又反映了他们从一般美国人那里学到的东西。今天,我将讨论两个社会学话题,即职业概念和疾病分类学的变迁。

中文“职业”一词既表示“occupation”,又表示“profession”,但在西方关于社会的思想里,其意义完全不同。这是数世纪的文化差异造成的。按照社会学家的看法,任何职业都是 occupation,但是只有需要水平很高的教育并且由此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职业才是 profession。

① 对于医学效能的这三个组成部分的最佳讨论,参见 Daniel Moerman, *Meaning, Medicine and the “Placebo Effect”*, Cambridge Studies in Medicine Anthropology,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② Sun Xiaochun and Jacob Kistemaker, *The Chinese Sky during the Han: Constellating Stars & Society*, Leiden: E. J. Brill, 1997。

在早期欧洲大学里(大约1200年以降),只有三个群体接受的教育在基础教育以上:神父或牧师、律师和医生。不像其他职业,这些群体自身就赋予其中的人们三种特殊的权力:这些群体自身控制着谁从事这些职业、决定付给成员多少钱,而且可以阻止无资格者从事这些职业。19世纪以来,神父和牧师失去了很多社会权力。今天,医生和律师是两个标准职业。其他群体,比如科学家,也试图获得同样高的地位,他们使用同样的方法——如控制研究生教育等等。但是多数科学家都是大学和其他机构的雇员,他们不能分配自己的收入,也不能控制从事科学的人。

## 医学社会学

在多数欧洲国家和美国,医生和律师仍然是所有职业中有最高威望者。然而,遍布许多国家的公营或私营医疗保险的特殊体制,已经夺走了医生对自己收入的控制,使平均收入少多了。越来越多的律师成为雇员,而不是作为其他律师的伙伴而工作。因此,这两种职业的自治权和职业特征正在消失。在某些国家,这种特征已经消失了,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些人是政府雇员。

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特征,医学是一种 occupation,而不是历史意义上的 profession。在古代,不管受到的教育如何,任何人都可以行医,多数医生都是老医生的弟子,而不是在特殊学校里接受训练。他们不需要专门的学位或者行医执照。政府举行医学考试长达许多世纪,不过这些考试通常只针对太医局官职,并不是针对一般行医者的。太医局的成员的确是官员,但是其职位并不高。<sup>①</sup>

没有官职的医生常常抱怨他们称为庸医的那些人的竞争,但却不能阻止他们行医。医生的收入取决于其个人的声望,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老师的声望。但医生的声望不一定取决于疗法。许多医学家有名,是因为他们的非医学的高阶官职或者是因为他们是杰出的文学家。这样的人给友人

治疗,并不打算靠医术谋生。宋代两个很著名的例子是沈括和苏轼。但是,那些作为医生来谋生的人拥有许多不同的社会地位,他们不得不与各种宗教治疗师及大众治疗师竞争。1920年代之前,医生并没有形成一个职业。

中国自1949年以来,是政府来决定谁是医生、分配收入、决定谁不再有资格行医。许多全职或兼职私下行医的医生可以增加收入,但是政府仍然控制着大部分行医活动。

总之,世界各地的医生职业都不同。他们的社会地位因国而异,并且在每个社会都发生了变化。我关于职业和工作的观点就是,社会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不同社会里医生权力的差异。我们已看到,权力是他们治愈疾病的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 疾病社会学

社会学里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定义疾病。从前,人类学家就发现,不同文化有不同疾病。并非惟有科学研究才能决定什么是一种疾病。即使是在接壤的欧洲国家,医生对疾病和疗法的理解也相当不同。在任何一个国家,对什么是一种疾病的理解都在持续而迅速地变化。<sup>②</sup>让我举两个美国的例子,而在这两种情况下欧洲的现状则不同。

18世纪时基督教在美国有极大的权力,常醉酗酒是一种违背宗教伦理的罪孽(sin),被神父或牧师指责是有罪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常醉酗酒成为非法,是受法官惩罚的法律上的罪行(crime)。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当众醉酒的人常常被捕。20世纪末,酗酒成为一种疾病,它的名称变成了“酒精中毒”。

这并不是因为医生发现了一种疗法,他们也不能解释酒精中毒的原因。社会学家论证说,醉酒从一种宗教道德上的罪孽转变为一种法律上的

<sup>①</sup> 参见梁峻:《中国古代医政史略》,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年。

<sup>②</sup> 佩耶巧妙地研究了英、法、美、德的这个问题。尽管在最近20年里,这四个国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至今没有类似的研究。参见 Lynn Payer, *Medicine & Culture: Varieties of Trea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England, West Germany, and France*, New York: Henry Holt, 1988, 1995。

罪行,是宗教权力缩减和国家权力增长的结果。醉酒转变为酒精中毒,或许是由于对醉酒的惩罚过多而无效所致。“醉酒”暗示某人是坏人;“酒精中毒”则是指一种病患,而并非个人过错问题。医学无能力治愈它无关紧要。医学不能治愈许多其他严重的身体问题,比如癌症。尽管医学不能治愈酒精中毒,但是很多人仍希望有一天医学在法律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

在美国,老衰或老年痴呆过去相当常见。得了这种病,老年人失去记忆,变糊涂,甚至经常连家人都不认识。同时,阿耳茨海默氏病(Alzheimer's disease)是一种罕见的疾病,患此病的年轻人有相同的问题。二者症候几乎相同;主要差别是年轻人极少出现这些症候。两种病都不能治愈。奇怪的是,过去20年里,医生已经停止诊断老衰。现在,即使患者很老,他们都用“阿耳茨海默氏病”的说法。这已经从罕见的诊断变为常见的诊断,而且医生不再判定这种病是老衰。这种变化并非来自新的科学研究。更确切地说,这似乎是人们认为一个不好的词变成了一个中性的词。

同类例子很容易找到。<sup>①</sup> 这些例子暗示,新的疾病和疾病名称的改变,并非仅仅基于研究上的改进。医生就像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对其社会广为流传的价值观做出响应。如果他们不做出响应,他们就不可能很成功地治愈患病的人们。

如果一位医生认为过量饮酒并非坏行为而且也不是病,那么,他在酒精中毒的治疗中就扮演不了什么角色。如果其他医生在谈论阿耳茨海默氏

病时,他却坚持称患者是老衰,那么错的就是他而不是他人了。类似这样的例子表明,疾病的命名是一个社会现象,在这种现象中医生和外行彼此影响直至他们达成一致。事实上,某种特定的诊断有时成为一种时尚。这是社会学有必要据以充分理解医学的诸多方式中的一种。

## 结 论

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有着不同的出身,发展了不同的概念。但是在过去一百年间,他们阅读彼此的著作,意识到许多相似之处。一些人类学家终于开始研究精妙得像他们自己的文化那样的文化——例如中国文化。我的一位老师过去常常说,如果中国人类学家对美国社会进行研究,那么,美国人就能学到很多东西。现在,有许多人类学家研究他们自己的文化。<sup>②</sup> 同时,社会学家发现,他们的技巧在研究不同于他们自己的社会时很有用。自然,两个群体终于开始学习既使用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又使用社会学的社会概念了。只是学科建制并没有迅速变化,两者仍然有不同的专业协会、学报等等。

我的下次演讲论述大众文化,将着手处理人类学和社会学在科学史和医学史中的其他用途。

(任安波译,任定成、席文校)

(责任编辑:桑海)

① 参见阿茹诺维茨对疾病变化所做的许多类似的分析。Robert A. Aronowitz, *Making Sense of Illness: Science, Society, and Disease*, Cambridge History of Medicin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亦见 Arthur Kleinman, *Social Origins of Distress and Disease: Depression, Neurasthenia, and Pain in Modern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② 第一位研究中国文化的中国人类学家是许烺光,参见 Francis L. K. Hsu, *Religion, Science and Human Crises: A Study of China in Transi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West*, 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Reconstruction, London: Routledge & K. Paul, 1952.

## ABSTRACTS

### Methods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Medicine

Nathan Sivin

Anthropologists' aim is to discover shared structures of meaning, which differed from one people or even one group to another. All parts of the shared sense of reality are called culture. People in two cultures do not have exactly the same diseases. There are many ways to divide all physical abnormalities into diseases, and people in different cultures make different choices. Belief can cause and also overcome real physical illness, for the body responds to belief and meaning. Sociologists' aim is to comprehend the structures, norms, and values of the society in which individuals live. Sociology can aid in understanding differences in the authority of doctors in different societies; authori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ir ability to cure illness. New diseases, and changes in the names of diseases, are not only based on improvements in research. Physicians, like all other members of society, respond to values that are widespread in their society. If they do not, they cannot be very successful in curing sick people.

### A Brief Discussion on Comparative Histor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heories of History in the 20th Century

Xin Chen

Research o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since the 20th century finds it hard to escape the influence of the West. Chinese historians have outgrown grief and indignation and become confident, which is at once a development histor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and a psychological history showing how the academic field picked up their confidence again. This article divides 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heories of history in the 20th century into three stages: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first stage is that historians used Western method of historiography to restrain the Chinese way, opposed the old ways, sought reform and emphasized the comparison of aims and methods of history; in the second stage, however, histories borrowed strength from West historiography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reflected the Western historiography so as to reshape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emphasized the comparison of concepts and historical view; in the third stage, historians sought after differences between Western and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hile keeping the common ground in mind, distinguishe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sought differences from similarities, and emphasized the comparison of thinking styles. The above three stages opened up one after another, each exploring further in the research of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theories of history, and each deepen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ography. At present, Chinese historians plays a dominant role in this field of study while the participating of western historians is likely to provide a wider field of vision for us.

###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Controversy

Yong Zhang

The *Democracy or Dictatorship* controversy is an important case in the field of the studies in the *climate of opinions*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1930s. It can be showed by a close and meticulous survey that the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controversy was a component part of the debates of *The Question of State-building* in the journal *Independent Review*, which, in the wake of the Sep. 18, can be said to be an expression of the positions of the upper class of the liberal intellectuals who actively pushed their collaboration with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with their intentions to reform the civil governance and resist the foreign invasion. This controversy was stimulated by the Fujian event, and the viable mode of unification—literally, the unification by the force of an individual dictatorship, or the unification by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of a democratic government—that Nanking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choose was rendered as its explicit topic. But implicitly, these different views reflected the then existing political power framework of the Nationalist Party, which can be oriented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hiang Kai-shek, or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ang and Jingwei Wang. This implicit meaning of the *Democracy or Dictatorship* controversy was disclosed by an episode of this controversy, namely the debate on *construction or non-action*. The above connotation of this controversy can be seen clearly in relevant discussions in the wake of that debate.

### Theoretical Issues on Study of Tributary System

Zhiqiang Chen

The conception, guiding theory and dynamic mechanism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ributary system are the three basic issues in theoretical study of tributary system. These three issues seemed unrelated, but in fact inseparable, seemed insignificant, but in fact